



西洋经学

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ZhongGuoWenXue

中国文学

下册

刘松来◎著

本书对中华学术做了系统的研究，对两汉经学做了宏观的考察与周全的论述，力求从文学研究中总结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为推动中国的学术文化而做出努力，鼓励更多学人参与，致力于继承与发扬近年来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西洋 书经 学



中国文学



下册

刘松来◎著

本书对中国文学做了系统的研究，对两汉经学做了宏观的考察与周密的论述，力求从文学研究中总结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为推动中国的学术文化而做出努力，鼓励更多学人参与，致力于继承与发扬近年来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

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 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导 论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	1
——经、经学与两汉文学	
一 “经”与经书文本的文学价值	2
二 两汉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7
三 经学夹缝中生长的两汉文学	12

上 编 文学视野中的经书文本

第 一 章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19
——关于《周易》的文学解读	
一 《周易》卦、爻辞中的原始歌谣风貌	20
二 《易传》文学思想管窥	28
第 二 章 “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	38
——关于《尚书》的文学解读	
一 史官文化传统与历史散文雏形	39
二 几种文学表现手法的初步尝试	43
三 中国古代散文体式的滥觞	50

第三章 “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 乾坤绝妙辞”	56
——关于《诗经》的文学解读	
一 《诗经》情感类型及其文化内涵	56
二 意念展示与《诗经》的情感表达	71
三 《诗经》情景关系的文化解读	80
第四章 “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	90
——关于《左传》的文学解读	
一 “惩恶劝善”与儒家的文学主张	91
二 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	99
三 《左传》描写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	105
第五章 “礼乐之说，管乎人情”	116
——关于《礼记》的文学解读	
一 “乐”的概念及其艺术本质论	117
二 “温柔敦厚”与儒家的“中和之美”	125
三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儒家的文质论	133
四 “惟君子为能知乐”与儒家的艺术鉴赏论	140

中 编 文化视野中的两汉经学

第一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49
——汉初文化学术的整合与再生	
一 黄老之学兴盛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150
二 汉初诸儒对黄老思想的吸纳与整合	160
三 黄老告退与儒学复兴	168

第二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71
——儒学独尊与今古文经学的文化透视	
一 儒学独尊与文化专制的形成	171
二 今文经学的传承与特点	185
三 古文经学的传承与特点	208
四 今古文经学的论争、融合及其文化学术意义	219
第三章 “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232
——经学式微与学术文化复归多元	
一 经学的畿纬化及其批判	233
二 “党锢之祸”与经学的衰落	245
三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与学术复归多元	253

下 编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文学

第一章 “发乎情，止乎礼义”	273
——经学语境中生成的汉代文学理论	
一 《诗经》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274
二 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话语体系	291
三 经学语境之外的文学理论之声	309
第二章 “约符命以经术，贯天人于治教”	324
——汉代政论散文的经术化及其背离	
一 汉初政论散文的特点及其经术化走向	324
二 武帝至元、成之世散文经术化的完成	338
三 东汉中后期政论散文对经术化的背离	352

第三章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363
——汉代赋体文学流变与经学的关系	
一 骚体赋问世与汉初政治学术的内在因缘	364
二 汉大赋的话语方式与经学语境之关联	372
三 经学衰微与赋的文体升华	398
第四章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13
——史传文学勃兴、演变与经学的关系	
一 《史记》史学成就与文学要素的现代解读	414
二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接纳与超越	432
三 《汉书》问世与史传文学向经学全面归附	450
第五章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466
——汉代诗体文学与经学的关系	
一 礼乐复兴与“乐府”机构的重建	467
二 经学语境中的汉乐府创作	473
三 汉代经学与文人四言诗	488
四 两汉经学终结与文人五言诗崛起	496
余 论 “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503
——两汉经学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512
后 记	515

下 编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文学



第一章 “发乎情，止乎礼义”

——经学语境中生成的汉代文学理论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从它在汉代统治者的扶持下荣登学术霸主的宝座之后，就开始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学而言，它在两汉时期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为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准备好了合适的土壤。但在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中，文学的发展毕竟深受经学的左右。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文学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先秦以来的《诗》、《骚》两大传统向前演进的。由于经学昌明，儒家的伦理实用价值观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所以使得汉代文学前进的脚步不但显得十分滞重，而且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直至汉末，伴随着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多元趋向的抬头，文学才真正从功利实用的价值观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开始初步显露出自身作为一种独立文化形态的迷人风采。

就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而言，理论不但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还带有更多的理念成分。这就使得汉代的文学理论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背负的经学“十字架”显得更为沉重。可以说，汉代的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本身就是在经书文本的阐释中形成的，是经学著作的副产品。由于经学所尊崇的《五经》文本中，《诗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汉代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看，就形成了一种以《诗经》阐释为中心，以伦理道德

规范为旨归的经学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而“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是这种文学观的最高追求。对此，罗根泽先生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两汉是封建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绩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的享受那时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于儒家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它的护身符。”^①当然，汉代的文学理论所讨论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诗经》，而是涉及到了对屈原作品和汉赋作品的评价。尽管这种评价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立足于经学立论这一点却是共同的。这种情况再次表明，汉代的文学理论确实是在经学的语境中生成的。

一 《诗经》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秦始皇的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使得一个赫赫王朝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便形成决堤之势。汉朝统治者继秦而起，不得不采取宽法令、解书禁、薄赋敛的休养生息政策，于是各种学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逐渐得到复兴，儒学也不例外。在汉初兴起的那场总结亡秦经验教训的文化反思运动中，不少有识之士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儒家之道，特别是陆贾《新语》、贾山《至言》、贾谊《新书》的问世，更使儒学治国安邦的价值逐渐被上层统治者所认同。在汉代历史上，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个尝到儒家礼乐制度甜头的君主。据史书记载，刘邦在即位之初，由于是“马上得天下”，所以对儒家的礼乐制度不以为然。然而后来当他大宴群臣，论功行赏时，面对着吵吵闹闹的朝堂秩序，深感无可奈何之际，

^① 《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一位名叫叔孙通的儒生出面为他解决了这一难题。叔孙通解决难题的手法就是依照儒家的礼乐制度，制订出了一套完整的朝仪。自此以后，朝堂之上文武大臣无不依礼而进，侍立两旁，山呼万岁，令人肃然起敬。刘邦于是感慨万端地说：“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汉书·礼乐志》）从汉文帝开始，朝廷逐步立儒学《五经》为官学，设博士官。虽然此时的博士还只是“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但还是对儒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为日后董仲舒之类的经学大师的产生准备好了合适的土壤。与此同时，汉朝前期奉行的清静无为和修养生息的黄老之术也开始显露其负面作用：藩国尾大不掉，土地兼并加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之后，开始弃黄老而重儒学，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汉武帝虽以儒术为尊，但他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阳儒阴法”的政策。因此在武帝在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儒学并没有真正取得学术至尊的地位。后来，完全是由于董仲舒的积极努力，建立起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春秋公羊》学，把“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传统儒学，改造成为阴阳刑名杂糅的汉家经术，从而以“天道”为依据，肯定了封建专制皇权的合理、合法，才使得经学上升为汉代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话语。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术化的主流话语左右下，本来就被先秦儒家弄得面目全非的“《诗》三百”，开始了它由文学文本向经学文本全面转化的扭曲过程。伴随着这一扭曲转化过程，一种独具特色的《诗经》阐释体系开始逐渐形成。对此，《汉书·艺文志》作了如下简要的说明：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轅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这就是汉代《诗经》阐释体系中著名的鲁、齐、韩、毛四大组成部分。按照经学流派划分，前三家属今文经学，后一家属古文经学。由于学派的不同，所以“三家诗”与《毛诗》在《诗经》的阐释过程中也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按照清代学者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的总结，可归纳为以下13个方面：

1、《毛诗》属古文经学，“三家诗”属今文经学。

2、《毛诗》晚出，“三家诗”早出。

3、“美”、“刺”说法有别。如《小雅·鹿鸣》，《毛诗》认为是美君臣宴饮，“三家诗”中的《鲁诗》则认为是刺君臣之失。

4、创作时间的说法有别。如《大雅·假乐》，《毛诗》认为作于成王之时，“三家诗”则提出是“美周宣王”之作。

5、诗旨说法有别。如《王风·黍离》，《毛诗》提出是“闵宗周”而作，“三家诗”则认定此诗是孝子伯奇为其后母迫害出走之后，“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

6、诗篇作者的说法有别。如《鲁颂》，《毛诗》提出是史克所作，“三家诗”则认定属奚斯之作。

7、所据经书文本有别，《毛诗》经文多用假借字，而“三家诗”则多用本字。如《小雅·都人士》中一句，《毛诗》为“垂带而后”，其中的“而”字，《齐诗》作“如”，《鲁诗》作“若”。

8、诗文训诂有异。如《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一句，《毛诗》释“窈窕”为“幽闲”；而《鲁诗》、《韩诗》则分别释之为“好貌”和“贞专貌”。

9、诗篇章数不同。如《小雅·都人士》，《毛诗》为六章，“三家诗”只有五章，缺首章。

10、诗篇章节的句数不同。如《载驰》，《毛诗》各章的句数为：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

“三家诗”则为：一章六句；二章八句；三章六句；四章、五章，章四句。

11、诗篇标题不同。如《小雅·节南山》为《毛诗》标题，“三家诗”的标题为《节》。

12、诗篇编排次序不同。如“召南”，《毛诗》按《鹊巢》、《采芣》、《草虫》、《采芣》次序排列；而《齐诗》则按《鹊巢》、《采芣》、《采芣》、《草虫》次序排列。

13、风诗编排卷数有别。“三家诗”合邶、鄘、卫为一卷，《毛诗》则将其分为三卷。

尽管“三家诗”与《毛诗》在《诗经》的阐释过程中存在着上述种种差异，但细加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其实都是细微末节的。就本质而言，它们之间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以史论《诗》，通过揭示《诗经》所包含的史实来传达政治教化和伦理道德思想，是“三家诗”与《毛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基本特征。换言之，将《诗经》内容历史化是这一阐释体系的基本手法，而服务政治教化则是这一阐释体系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汉儒说《诗》一般习惯于从寻绎本事入手，把大多数诗篇与历史上的某人某事相牵合，视《诗》的叙事言情等同于史书的“实录”，从而形成了“历史化”的倾向。在历史化的阐释过程中，史实与诗篇本义之间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诗义与史实基本吻合。汉儒在运用史实阐释诗义的过程中，有时直接与诗篇的内容挂钩。在这种情形中，诗义与史实之间一般不会存在出入。如《周颂·清庙》：

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毛诗》的解释是：“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

文王也。”《鲁诗》也认为是“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汉书·王褒传》）。将汉儒的阐释与《清庙》的内容两相对照，可以认定诗义与史实是完全吻合的。类似的例子，在《颂》诗和《雅》诗中为数不少。像《周颂》中的《维天之命》、《执竞》、《我将》，《大雅》中的《文王》、《文王有声》，以及《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黍苗》等诗篇，都是指名道姓之作。汉儒在阐释这些诗篇时，根据诗中提供的线索，将它们与相关的历史人物或事件相联系，自然不会出现大的纰漏。有的情况下，诗篇的内容虽然无法直接证实史事与诗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从其他史料的相关记载中，还是可以认定汉儒的阐释大体无误。如《陈风·株林》：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毛诗序》云：“《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诗中的“夏南”是指夏姬的儿子夏征舒。从诗歌本身的内容中虽然无法确定《毛诗》的解说是否正确，但我们只要联系《左传》和《穀梁传》中的相关记载，就可以作出相应的判断：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戏于朝……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杀之。二子奔楚。（以上《左传》宣公九年、十年）

陈灵公通于夏征舒之家，公孙宁、仪行父亦通于其家。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穀梁传》宣公十年）

可见《毛诗》的解释是有历史根据的，并非出于主观臆测。又如《齐风·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三家诗”与《毛诗》均认为诗歌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妹通奸的丑行：“《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毛诗序》）。诗中的“齐子”，即齐襄公之妹，名为文姜，鲁桓公之妻。文姜与齐襄公私通是先秦史书载之甚详的史实。如：

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左传》桓公十八年）

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撻干而杀之。（《公羊传》庄公元年）

尽管《南山》只是委婉地提到文姜出嫁之后，心中仍然别有所怀，并未直接指出她所怀为何人，但只要读者结合史书中的上述相关记载来寻绎诗义，就很容易认同汉儒说《诗》的观点。

第二，诗义与史实部分吻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得先秦史籍损毁严重。在史籍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汉儒对《诗经》的历史化阐释就难免出现纰漏，从而呈现出诗义与史实部分偏离、部分吻合的复杂状况。这中间有的是毫无根据地坐实诗篇的创作时

间。如《小雅·采薇》，其创作时间，汉儒就作过如下推测：

懿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①

（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②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③

以上数家关于《小雅·采薇》的阐释，其中对诗义的解说大体符合史实，而对该诗创作时间的看法却颇有分歧。这种分歧说明他们手中并没有掌握这方面的确切资料，所作的解说只是一种主观臆测。这点恰如清代学者方玉润所言：《采薇》“大抵遣戍役，时世难以臆断。”（《诗经原始》卷九）有的则错误地推测诗歌的写作目的。如《邶风·雄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上下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细细品味，完出可以读出这是一个女子思念行役在外的丈夫的忧思之作，而《毛诗序》则推论：“《雄雉》，刺卫宣公也。淫乱不

① 此为《鲁诗》之说，见《史记·周本纪》。

② 此为《齐诗》之说，见《汉书·匈奴传》。

③ 此为《毛诗》之说，见《毛诗序》。

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如果说《毛诗》有关该诗的内容涉及“男女怨旷”的解说大体与诗义相符的话，那么它关于诗歌的写作目的是“刺卫宣公”的推测则纯属无稽之谈。《陈风·泽陂》也是如此：

彼泽与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彼泽与陂，有蒲与兰。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

彼泽与陂，有蒲萋萋。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

诗歌三章反复抒写女子内心思恋着一位男青年而又无缘与他相处厮守的感伤。《毛诗序》却提出：“《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其中有关“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的解说固然与诗义吻合；至于说此诗的写作目的在于讽刺陈灵公君臣荒淫，则非但毫无历史根据，也与诗篇的旨意相去甚远。

第三，诗义与史实了无干系。汉儒在阐释《诗经》的过程中，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往往将历史化的手法运用过滥，以至于出现了不少强行将诗义与史实捆绑扭结在一起的“拉郎配”现象。这种情况在“男女各言其情”的风诗中尤为普遍。如《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此诗明明是表现一位少女既怀恋情人，又惟恐别人察觉的矛盾心